

#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

刘红华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海外部分中国文学外译本因过分忠实于原作而不能完全为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部分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无法充分地传达原文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有助于避免出现有问题的译作,为中国文化准确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以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外合作模式为文学外译之翻译活动发起者模式;以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浓厚的中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翻译立场的译者为文学外译之译者模式;以兼顾译文忠实与流畅的策略为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模式。

[关键词]中国文学外译;翻译活动发起者;译者模式;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3-0008-05

## Exploration on the Transl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U Hong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s “going out” strategy. The quality of some overseas translated tex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yet to be improved. Some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are too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o be completely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the target readers, while others cater for the target readers’ reading habit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Chinese culture reflected in the original texts couldn’t be fully transmitted.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uld avoid the produc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hence providing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hinese culture’s “going out” in an accurate and effective way. Firstly, its initiator should be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model 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condly, its translator model should be the translators with skillful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competence, bearing a deep love for China and taking a firm translation stand. Thirdly,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those which could realize both faithfulness and fluency of the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itiator; translator mode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国内多位译界学者们纷纷为中国文化如何通过翻译“走出去”出谋划策,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者模式、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等多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建构了具体的中国文化外译模式。译界目前建构的文化外译

模式综合考虑了翻译及翻译之后的传播与接受环节,不可谓不高屋建瓴,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国门提供了真知灼见。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效果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各种出版与销售策略的改善等息息相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需要一个

收稿日期: 2017-04-09

作者简介: 刘红华(1983-),女,湖南永州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翻译学、文学翻译。

长期积累的过程。翻译足够的文学作品并将其“送出去”是目前比较现实的一种策略。<sup>[1]</sup> 翻译足够数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确可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做足准备工作,但是把握译作传播效果这一关也不可或缺。目前海外部分中国文学外译本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译文过分忠实于原作;其二,译文过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第一个问题可能导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不佳。第二个质量问题可能导致中国形象与中国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受损。为解决上述问题,须产出既忠实于原作又符合目的语读者期待的译作。

究竟怎样的外译模式有助于产出既忠实又流畅的译作呢?对于这个问题,译界学者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基于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外译的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目前部分海外中国文学的外译本质量堪忧的问题,本文从翻译活动发起者、译者模式以及翻译策略这三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文学的外译模式,以确保产出更适合“送出去”的中国文学的外译本。

## 一 中国文学外译活动发起者

翻译活动发起者,主要指发起翻译活动的出版机构、文学代理人、译者或作者等。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中国文学外译发起者主要包括17世纪的西方传教士、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政府机构。在这三种发起人中,中国政府机构是较受译界学者诟病的,其发起的翻译活动被作为不成功案例的代表加以抨击,理由是:由其组织翻译出版的译作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并不理想、收效甚微。比如《中国文学》(英文版)杂志“译介效果并不显著”。<sup>[2]</sup>《熊猫丛书》同样“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sup>[3]</sup>《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sup>[4]</sup>

为传播与接受效果起见,中国文学外译的发起者似乎离不开国外出版社,因为他们更能把握并倾向于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能让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更佳。但是,由于所有文化从本质上讲,对外来事物都是抵制的,一个文化在需要吸收外来“他者”补充的同时,也会

抵制外来的“异质”,以确保本族文化的“纯粹性”与“完整性”。<sup>[5]</sup> 国外出版机构因此对外语文本和文化实施“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透明的”(transparent)、“流畅的”(fluent)归化翻译就是这一“暴力”实施的具体表现。国外出版社或编辑大都喜欢根据自己和英美读者的标准对译文进行大幅度删减和随意改写。<sup>[6]</sup> 由此可见,国外翻译活动发起者在保留中国文化的“纯粹性”与“完整性”上并无太大保障,更甚者,他们对译文的随意改写行为还极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在译文中遭到扭曲。

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活动发起者应该是以中国特别是中国政府机构为主导。“各国文学的外译离不开政府的支持”,<sup>[7]</sup> 而且“主动‘送出去’,特别是政府牵头‘送出去’,已成为除英语国家之外多数国家(地区)文学外译的常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sup>[1]</sup> 以中国政府牵头的翻译活动在翻译的质量把关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责任心也相对较大。但在译材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作销售与传播方法等方面,中国政府机构可以借鉴西方出版社的经验,选择性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争取综合考虑中国文化的“完整性”与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做到让“异域”的中国文化毫无理解障碍地被西方读者接受。这便涉及到中国政府机构与西方出版社、汉学家、代理人等的合作,只是中方要掌握这种合作模式的主动权,后者只能作为前者的协助者。

中国政府机构应怎样把握与西方出版社、汉学家、代理人等合作的度才能够达到中国文化真实而有效在海外传播的目的呢?首先,中国政府机构应宏观调控翻译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从整体上把关中国文学外译的选材、翻译、定稿、出版的全过程,杜绝西方出版机构为迎合目的语读者而随意篡改中国文学的行为,确保最终出版的译作的“完整性”与“纯粹性”;其次,中国政府机构应借助外力,弥补自己在把握西方读者阅读兴趣、接受能力等方面的缺陷,确保“不引起海外受众对我国文学和文化的反感”<sup>[1]</sup>,甚至能增强其“吸引力与感染力”。<sup>[8]</sup> 如在译材选择与定稿阶段听从西方汉学家、编辑等的建议;在翻译阶段寻求汉学家的帮助;在译作出版阶段可以将版权转让给西方出版社,一则可以消除外国读者对中国官方出版社的抵制而带来的销售障碍,<sup>[9]</sup> 二则毕竟世界著名出版机构是扩大中国小说在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sup>[10]</sup>

## 二 中国文学外译之译者素养

国内多位译界学者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出谋划策。在对译者模式的探寻中,有的认为为了中国文化少受损害,“中国译者模式”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sup>[11]</sup>有的考虑译作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建议“不妨请外援”,<sup>[12]</sup>或认为“汉学家模式”为较佳译者模式,<sup>[13]</sup><sup>10</sup>有的则综合考虑前两个问题,认为“中西合译模式”<sup>[14-15]</sup>最为理想。同时考虑中国文化通过翻译传播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中西合译模式”的确最为理想。因为有些汉学家可能会因学艺不精而对中国文化无意误译,也有一些可能会为了自己或自己国家的某些利益而故意误译中国文化。而大部分中国本土译者因对目的语语言规范的掌握还不够纯熟,对目的语读者兴趣的把握还不够到位,产出的译作无法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但“中西合译模式”也并非无懈可击,虽然这种译者模式能让中外译者各取所长,跨越差异,却也需要在翻译的各个环节不断地磨合,比较费时费力,最后还不一定能达成共识。胡安江曾提及,像葛浩文一样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的汉学家是最理想的译者模式。<sup>[13]</sup><sup>14</sup>汉学家本就不多,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汉学家更是有限了。

笔者认为有一类译者可同时解决汉学家数量有限问题与中西译者合作耗时耗力的问题,可以考虑作为中华文化外译的较佳译者模式。这一类译者就是居住于海外的华人译者与居住在中国的外裔译者,即“离散译者”。<sup>[16]</sup>他们集汉学家与中国本土译者两者的优势于一身,既具有汉学家对目的语的纯熟运用能力以及对目的语读者阅读兴趣的精准掌控能力,也具有中国译者对中国的浓厚情怀,对中国文化的充分理解的能力。启用离散译者暂且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外译优秀译者缺失的问题。毕竟目前移居海外的华人数量较为可观,居住在国内的外国人也日渐增多。

除了能力与汉学家不相上下之外,离散译者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也并不亚于汉学家。不管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译者沙博理、戴乃迭等,还是居住在中国的外裔译者聂华苓、王际真等,都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沙博理翻译了200部中国文学作品,译作题材丰富、质量上乘,被誉为“洲际文化的艄公”,其《水浒传》英译本在译界被奉为“信、达、雅”佳作典范;戴乃迭与

其丈夫杨宪益合作翻译了“整个中国”,共翻译了22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其中独译作品80余部,与杨宪益合译作品140余部,作品涵盖各种题材,夫妻二人合译的*Red Mansions*(《红楼梦》)享誉海内外;聂华苓是第一个在台湾翻译《毛泽东诗词》的人,其开办的国际写作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王际真翻译了《红楼梦》《战国策》《吕氏春秋》《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古代典籍与名著,还介绍了鲁迅、老舍、张天翼、叶绍钧、凌叔华、巴金和沈从文等中国现当代作家,被夏志清称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

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以及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译者,的确具备在译文中准确地保留原作中文化内涵的能力与情怀,但由于各种利益的驱使,他们在实际的翻译中不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上文提到部分汉学家可能会因各种利益而扭曲中国文化,部分离散译者亦是如此。如离散译者张爱玲就曾写作并翻译了丑化共产党与新中国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作品是张爱玲在复学无门,投奔美国驻港新闻处之后,出卖灵魂,胡编乱造,写出的“反共反华”的坏小说,后来她还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出版。可见,除个人能力与情感因素之外,译者还必须具有坚定的翻译立场,这种立场不能因个人利益而有丝毫改变。

综上,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译者可以考虑作为中国文学外译的较佳译者模式:1. 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包括对中国文学的透彻理解能力以及清晰的目的语读者意识;2. 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即热爱中国及中国文化;3. 具有坚定的翻译立场。

## 三 中国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策略包括归化与异化。归化追求译文的流畅易懂,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规范,而异化追求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的传真,以丰富译入语语言及文化。<sup>[17]</sup>译界在翻译中同时存在归化与异化策略上已基本达成共识,赞成归化与异化应相得益彰。<sup>[18-21]</sup>但是在中国文学的外译策略的选择上,学者们对于以哪种策略为主的问题仍然各执一词。有的赞成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以便更好地保留中国的异域文化,<sup>[22-23]</sup>有的则赞同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以便增加译本的可读性。<sup>[24-25]</sup>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加以争论已无太大意义,毕竟要保证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译者应尽可能地保留文学作

品中的“异质文化”,同时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我们目前要探究的是究竟在翻译中如何具体实施归化与异化策略才能达到以上两个目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孙致礼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在文化层面上,译者要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以保存原作的风味,而在语言层面上,译者则要进行归化以利于通俗易懂。<sup>[20]</sup>这种适度调和,既忠实于原作,又照顾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的确不失为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相得益彰、圆满调和之举。此处语言层面上的归化是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包括篇章布局规范、遣词造句规范等。

文化层面最大程度的异化与语言层面的归化(下文称“圆满调和策略”)可解决“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以及“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模棱两可的问题,也为这两种观点的殊途同归找到了缘由。“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观点倾向于保留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实际就是号召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观点倾向于照顾读者的阅读兴趣与理解能力,也即语言层面的归化。这两种观点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异曲同工。在文化层面的异化策略可减少中国文化外译中文化的损失,在语言层面的归化策略则可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可见,这种翻译策略的采用的确可以避免在翻译中出现本文开篇提及的两个质量问题。

“圆满调和策略”之于中国文化外译的较佳之处还体现在几位著名翻译家对这种策略的青睐上。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认为译者既要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的“异质性”,又要保持译文的流畅性。<sup>[6]</sup>沙博理认为要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全世界,但是必须要“用我们的英语把我们的中文意思传达出来”。<sup>[26]</sup>

“圆满调和策略”指导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关照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在这一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译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文化词的音、形、义。如在命名文化词方面,对于无特殊含义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应直接采用音译法,保留中国语言的拼音文化;对于特殊含义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应采用直译法保留其形与义;对于一部分有特殊含义而另一部分又无特殊含义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应采用音译+直译法,同时保留其音、形、义。

在习语方面,译者应尽量采用直译法保留其所

承载的文化意象与准确含义。对于部分歇后语,在直译令人晦涩难懂时,译者则可适当文内释义,以便读者清楚理解其准确含义。

译者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词的音、形、义,这其中的“最大限度”体现在译者可视情况对部分文化词进行意译处理。这些文化词包括:文化内涵厚重,大段注释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典故;形象性或逻辑性不强,直译之后令目的语读者费解的成语或歇后语;虽有形象性而格调不高或比较粗俗的,直译之后影响中国形象的成语或歇后语。

2. 合理遵循目的语的篇章布局规范。如在段落划分上,译者应遵循一个段落有且仅有一个主题以及人物引述独立成段的标准。如将原作中包含几个主题的一个段落按主题切分成几个小段;将原作中讲述一个主题的几个段落融合成一个段落;将人物的引述都独立成段。

在情节的处理上,译者通过调整句子甚至是段落的顺序来实现译文篇章的衔接与连贯,如在缺乏主题句段落的段首添加主题句,或将段落中已存在的主题句移至段首;在每章节开头添加主题段落,或将散落在章节内的主题段落移至章首。

在句法结构上,应巧妙使用英汉语共有的句法结构。游离句是英汉语中共有的一种句法结构。译者可在翻译中使用游离句来达到忠实于原作句式以及迎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双重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倡导“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sup>[8]</sup>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数量与质量。为中国文化“送出去”积累足够多的、高质量的中国文学的外译本,是中国文学外译艰巨而长久的使命。而符合习总书记《意见》中所倡导的高质量的中国文学的外译本应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忠实传达原作中所承载的中国精神与文化;其二,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本文的努力方向正是探寻合适的外译模式以便产出具有以上两个特点的译作。经探究发现,中国文化外译模式可为产出上述高质量译作提供一定的借鉴:(1)翻译活动发起者:以中国政府为主导,西方出版机构、汉学家等从旁协助;(2)译者模式: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浓厚的中国情怀、坚定的翻译立场的

译者。(3)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圆满调和,即在文化层面以异化为主,在语言层面以归化为主,以便在目的语读者充分理解原作的前提下忠实传达中国的文化内涵。

### 参考文献:

- [1] 韩子满.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送出去”[J]. 外国语文, 2016(3): 65-73.
- [2] 郑 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2012.
- [3] 耿 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2010.
- [4]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1): 2.
- [5] BERMAN Anto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49.
- [6]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 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2(1): 57-60.
- [7] 马士奎. 英语地位与当今国际文学翻译生态: 《译出与否: PEN/IRL 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解读[J]. 民族翻译, 2013(3): 36.
- [8] 习近平.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 [2016-11-04]. <http://www.ihchina.cn/11/33213.html>.
- [9] 鲍晓英.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J]. 中国翻译, 2013(5): 62-65.
- [10] 李清柳, 刘国芝. 外文社版英译中国当代小说在美国的传播[J]. 中国翻译, 2016(6): 37.
- [11] 潘文国. 译入与译出: 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 中国翻译, 2004(2): 40-43.
- [12] 谢天振. 译介文学作品不妨请外援[N]. 中国文化报,

2013-01-10(2).

- [13]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 2010(6): 10-14.
- [14] 黄友义. 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 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J]. 中国翻译, 2010(6): 16-17.
- [15] 胡安江, 胡晨飞.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 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4): 54-61.
- [16] 刘红华, 黄 勤. 译者聂华苓研究综述[J]. 翻译论坛, 2015(2): 64.
- [17] 刘艳丽, 杨自俭. 也谈“归化”与“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6): 22.
- [18]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 1998(2): 12-19.
- [19] 陈丽莉. 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 中国科技翻译, 1999(2): 43-45.
- [20] 孙致礼. 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J]. 山东外语教学, 2001: 32-35.
- [21] 罗选民. 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异化/归化翻译[J]. 外语学刊, 2004(1): 102-106.
- [22]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1): 40-44.
- [23] 张智中. 兼容并蓄 双层操作: 异化归化之我见[J]. 语言与翻译, 2005(2): 44-48.
- [24] 王志勤, 谢天振.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问题与反思[J]. 学术月刊, 2013(2): 21-27.
- [25] 汪庆华.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 以《红楼梦》英译为例[J]. 外语教学, 2015(3): 100-104.
- [26] 沙博理. 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J]. 中国翻译, 1991(2): 4.

责任编辑: 李 珂